

# 论梅茹耶夫的社会主义论证策略及其内在局限

亓盼盼, 梁 豪

(上海理工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上海 200093)

**摘要:** 随着世界社会主义运动进入相对低潮期, 为马克思社会主义思想进行有效论证迫在眉睫。梅茹耶夫的创新在于从文化维度进行论证, 其论证具体展开为: 从理论本源厘定马克思社会主义思想和苏联社会主义理论是两种不同性质的文明的产物; 通过探析科学、意识形态和乌托邦能否实现真正结合, 肯定马克思社会主义思想的科学性; 以人类自由为根据阐明马克思社会主义思想的当代性。不过, 梅茹耶夫的论证有其局限性, 需要进一步加以完善。

**关键词:** 马克思社会主义; 苏联社会主义; 文化纬度; 人的自由发展

**中图分类号:** A 81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895X(2024)06-0559-06

**DOI:** 10.13256/j.cnki.jusst.sse.211226495

## The Cultural Logic and Defects of Mezhujev's Defense for Socialism

QI Panpan, LIANG Hao

(School of Marxism, University of Shanghai for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hanghai 200093, China)

**Abstract:** When the socialism movement encounters a relatively low tide, how to effectively defend Marx's socialist ideology has become an urgent theoretical issue. Mezhujev's innovation of socialism lies in its defending in the cultural dimension. The theoretical origins determine Marx's socialist ideology and the Soviet Union socialist theory are the products of two different kinds of civilization. The scientific nature of socialism is affirmed by analysis of whether science, ideology and utopian can achieve real combination in the socialist ideology. The contemporary nature of the socialist ideology is explained on the basis of human freedom. However, Meiruyev's defense of socialism has its flaws and need improving.

**Keywords:** Marxian Socialism; Soviet Socialism; cultural dimension; human freedom and development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苏东剧变, 在国际学术界引发了两种理论反应。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等为代表的西方保守主义理论家宣称马克思主义已彻底失败, 进而断言资本主义制度是人类历史的“终结”; 而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者与左翼阵营在继续批判资本主义制度的同时,

回过头来对共产主义运动和社会主义的前景展开了一系列新的反思。在这种理论的分歧、碰撞与交锋中, 俄罗斯“反思的马克思主义”之主要代表人物梅茹耶夫(B. M. Mezhujev)敏锐地意识到了“向马克思的回归是不可避免的”<sup>[1]</sup>, 并且对此进行了别出心裁的论证。他选择从文化哲学的视角切入,

收稿日期: 2021-12-26

基金项目: 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2018WLL005)

作者简介: 亓盼盼, 女, 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E-mail: 1074619283@qq.com

通信作者: 梁 豪, 男, 副教授。研究方向: 经济哲学。E-mail: lh16164740@163.com

试图通过对文化传承与发展逻辑的推演,展开对马克思的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性与合理性的深度论证。国内学界对于梅茹耶夫所做努力的评价,可谓见仁见智。姜立红等赞赏梅茹耶夫将社会主义视为一种文化空间的设想,认为他为社会主义研究提供了一个崭新的开放性视角<sup>[2]</sup>。与此不同,许恒兵则认为,梅茹耶夫所标举的文化实质上是一种抽象文化,故其社会主义文化哲学思想存在陷入抽象人本主义泥潭的风险<sup>[3]</sup>。既有研究集中于文本内容分析,对梅茹耶夫的论证策略则关注不够。本文力图理清梅茹耶夫社会主义论证策略、论据及其结论的逻辑线索。这对于恰当定位梅茹耶夫的思想贡献,以及在当代更好地批判性继承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经验与教训,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价值。

## 一、基于理论本源界划马克思社会主义思想与苏联社会主义理论

在梅茹耶夫看来,长期以来俄国人对待马克思和社会主义思想的态度都是“非文明的”。苏联时期人们圣化马克思,毫无保留地尊崇社会主义;苏联解体后,人们将马克思视为“鬼蜮”,尖锐地批判社会主义。然而,俄国人没有意识到的是,他们所尊崇的或者所批判的并不是由经典马克思主义所提供的社会主义思想,而是苏联社会主义理论。因此,要将社会主义思想从流俗的“非文明态度”中拯救出来,就必须划清马克思社会主义思想与苏联社会主义理论之间的内在界限。颇具新意的是,梅茹耶夫不是通过宽泛地比较社会主义思想和苏联社会主义理论之间的种种差异,而是经由追溯二者各自不同的“理论本源”,通过语境分析来确立它们之间的分界。

梅茹耶夫认为,马克思是一位欧洲思想家,其社会主义思想同样诞生于欧洲,是近代以来欧洲文明自我批判和自我否定运动的产物。而欧洲文明的自我批判和自我否定运动源发于欧洲文明所内蕴的深刻矛盾。矛盾的一方是“资产阶级文明”或者说资本主义文明,另一方则是自文艺复兴时代起开始形成的近代欧洲文化。资产阶级文明以个人利益为动力,通过在人类生活的一切领域贯彻社会分工原则而将人原子化,造就了分散的、个别的个体,然后用违背他们个性的枷锁将他们束缚在一起。古典欧洲文化则将人的创造性地实现自我和自由奉为存

在原则。然而,二者在欧洲文明内部并未融洽为一体,而是彼此偏离乃至相互排斥。从古典欧洲文化来看,欧洲文明培养的应当是自主的个人,但是实际上产生的却是对人的否定;资产阶级文明在其形成和发展过程中粉碎了所有捆绑人性的信仰和禁令,本应带来人的自由,但实际上它建构的却是物(商品、货币特别是资本)的自由空间,人反倒成为了物实现自身自由的工具。时至19世纪,欧洲文明的这种内在冲突开始被马克思、尼采等知识分子察觉到,于是他们提出了欧洲文化危机论题,认为随着人的社会生活的极度理性化和实用化,创造性地实现自我和个性自由已经被人的现实存在的单向度、标准化和无个性化所替代,人不再有一点儿时间和丝毫可能性进行个人选择和自由决断。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深刻地将这一危机的实质归结为人的异化。梅茹耶夫指出:“只有在这样一种语境下,像社会主义这样的批判理论才能产生。”也只有在这种语境下,我们才能够真正地领悟到,社会主义思想起源于欧洲文化的人道主义目标。事实上,马克思不但把“19世纪的伟大经济运动所追求的目标”明确地归结为“人道目标”<sup>[4]233</sup>,而且直接地将共产主义称为“现实的人道主义”<sup>[5]335</sup>,强调共产主义继承和发展了近代人道主义传统。社会主义思想正是站在人道主义文化的立场上,从人的个性维度出发,追求人的自由和发展,从而构成了对欧洲资产阶级文明的批判。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社会主义思想诞生于近代欧洲文明内部,是欧洲文化一种新的存在形式。

按照上述分析思路,梅茹耶夫继而提出,苏联社会主义理论,特别是它的最初形态即布尔什维克主义,折射出更多的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俄国的自我理解和自我认识。换言之,要阐明苏联社会主义理论的本源,就需要考察近代俄国的社会发展史和文化,深入准确地把握住俄国现代化进程的脉搏。一个历史实情是,俄国是在西欧诸国早已实现现代化之后方始摸索着踏上现代化之路。无论在传统工业技术方面还是在社会发展方面,俄国都远远落后于欧洲发达国家,因此,它所面临的主要任务是“快速现代化(首先是工业化)建设”<sup>[1]9</sup>。问题在于,它是否有可能以欧洲的方式,亦即通过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在民主和市场经济的制度下来实现自身的现代化?梅茹耶夫的回答是否定的。因为“当时没有任何一种民主形式能够对俄国历史上的两个根本问题做出回答”<sup>[1]10</sup>,这两个问题就是农民问题和民族问题。一方面,对于生活在古老的宗法制村

社中的俄国农民来说,最根本的问题莫过于他们对于土地和自身劳动产品的所有权问题。因此之故,他们是否支持一种政权以及支持程度的高低,就主要决定于该政权对所有权问题的解决,而不是取决于政权在自己的活动中所应遵循的法律。“这些农民世代所幻想的并不是宪法和法制国家,而是拥有自己的土地和过富足的生活。他们从何而知二者是相互依存的呢?”<sup>[1]13</sup>另一方面,俄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但这些民族并没有成功地融合在一起,那么怎么样才能够维持多民族国家的完整性呢?这构成了俄国历史的第二个根本问题。历史经验教训表明,市场经济和民主不是解决这一问题的有效途径。总之,俄国对于以民主和市场经济的方式来实现现代化尚未做好历史和文化准备,这就决定了它不可能走欧洲的现代化之路。换言之,俄国必须另辟蹊径。事实上,俄国的现代化模式最终在政治上采取的是非民主的方式,在经济上实行的是俄国传统意义上的动员式经济体制。质言之,苏联社会主义理论实际上是一个前现代化国家动用本国传统资源来实现自身现代化的“纯粹的俄国理论”<sup>[1]21</sup>,尽管它使用了马克思主义的语言。

所以,从理论本源上看,马克思的社会主义思想和苏联社会主义理论其实是两种不同性质的文明的产物。马克思的社会主义思想根植于欧洲文明的自我批判和自我否定运动,但是对于俄国这样的非欧国家来说,社会主义并不是它自身所固有的本质,而只是它的现代化战略的一种变形。因此,苏联社会主义理论特别是布尔什维克主义,其理论本源“不应归之于马克思主义,而应归之于俄国历史和俄国革命的特殊条件”<sup>[1]19</sup>。当然,这并不意味着苏联社会主义理论与马克思社会主义思想毫无关系,事实上,前者向后者借用了它的无产阶级革命和专政理论。在梅茹耶夫看来,这恐怕是二者之间的唯一联系。由此来看,布尔什维克主义的破产只不过验证了无产阶级革命和专政理论在苏联的失败。

## 二、梅茹耶夫的社会主义观

### (一) 论证社会主义思想的科学性

以上分析表明,苏联“现实社会主义”的失败并不能证明马克思社会主义思想的非科学性。那么,相对于资本主义,马克思社会主义思想是否具有科学性?换言之,它究竟是科学理论抑或意识形态,甚至只是乌托邦?一种由来已久并且流行至今的看

法是,社会主义思想只是一种意识形态和乌托邦,毫无科学性可言,根本就不是“科学社会主义”。梅茹耶夫无疑必须对此做出回应,为马克思社会主义思想的科学性进行有效申辩。他所采取的策略主要是从总体上承认马克思社会主义思想是科学、乌托邦和意识形态的“三位一体”,就是说,它既不是单纯的科学理论,也不是纯粹的乌托邦或意识形态,而是三者的结合。这样一来,问题的关键就在于这三者能否实现真正的结合:如果回答是肯定的,那么乌托邦和意识形态因素就不会损害社会主义思想的科学性。故而,梅茹耶夫将其辩护重点置于论证科学与乌托邦、科学与意识形态能否实现真正结合上。

梅茹耶夫认为,马克思社会主义思想的确包含某些乌托邦因素,具有一定的乌托邦性质。不过,这一点无关宏旨,因为任何意识形态,只要它的理想和目标超出了现存制度所能允许的界限,就不可避免地具有乌托邦性质。真正重要的是,社会主义思想的乌托邦性质究竟是相对的还是绝对的?在梅茹耶夫看来,社会主义思想是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批判的结果,它是否具有绝对乌托邦性质取决于这一批判是否具有科学依据,是否实现了科学性与批判性的真正结合。众所周知,马克思既反对以历史之外的尺度来评判资本主义社会这种非科学的批判主义,例如空想社会主义,也反对那种不能突破资本主义社会的存在界限、将资本主义社会永恒化的“非批判的实证主义”,例如历史实证主义。而在马克思的资本主义批判中,批判性和科学性辩证地结合,融合于一个统一的理论思维空间,也即马克思所创建的“历史科学”。历史科学将人本身的历史作为研究对象,认为人的本质是自由,人的历史不仅本质上是人类奔向自由的过程,而且以人类自由为其初始条件、根本动力和最终目标。自由对人类历史的决定性作用随同历史进程的展开而不断增强,在此过程中,一旦人逐渐从外部必然性的统治下解放出来,这种决定性作用将获得新的、更加符合其自身表现的形式。资本主义社会作为一种社会活动形式,固然不乏推动自由扩展的积极作用,但却是其内部为自由设置了不可逾越的界限。正因如此,就有必要建构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批判,一方面科学地揭示资本主义社会相对于人类自由的内在局限性,另一方面科学地展现人的充分自由和全面发展在新的社会形式中如何实现的可能。在此意义上,梅茹耶夫中肯地指出:“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是以科学理论形式而体现的整个人类历史的真理。”<sup>[1]43</sup>

马克思社会主义思想是否实现了科学与意识形态的真正结合?梅茹耶夫认为,马克思试图结合无产阶级自我意识与科学理论,但这种结合注定要走向失败。其原因首先在于,从社会认知维度来看,科学追求真理知识,而意识形态是对现实生活的虚假和错误反映,属于虚假知识。从阶级利益维度来看,科学探究普遍真理,而意识形态作为一种阶级意识只反映部分阶级利益,不具有“普遍知识”资格,尽管它将这一利益绝对化、永恒化并把它伪装为普遍利益。因此,科学和意识形态这两个范畴内在地相互冲突。其次,按照马克思恩格斯的看法,当一个阶级的利益与社会大多数人的利益乃至全人类利益相一致时,这一阶级就能够以理性的科学语言来表达自己的利益,而无须任何意识形态伪饰,而无产阶级就是这样的阶级。因此他们认为,社会主义作为表达工人阶级自我意识和根本利益的学说,当然是科学的学说,但是梅茹耶夫却未认识到这一点,反而将其作为一个尚未得到充分论证的悬设。最后,20世纪之后的资本主义,特别是后工业社会的发展表明,社会主义理论与工人运动实践之间实际上缺乏直接的、必然的联系。“无论如何,在19世纪状况下所形成的工人阶级,在今天已经不足以威胁到资本主义,而且在他们身上也很难发现变革现存制度的自觉愿望。”<sup>[180]</sup>由此可见,科学和意识形态在马克思社会主义思想中并没有实现真正的结合。

在社会主义思想中,科学与乌托邦的结合是可能的,但科学与意识形态的结合必定以失败告终。不幸的是,这种失败严重损害了社会主义思想的科学性,许多批评者正是据此指责它完全是一种有关社会主义乌托邦的非科学宣传。鉴于此,梅茹耶夫主张,为了确保并净化社会主义思想的科学性,必须将社会主义思想的意识形态因素剔除出去。他为此提出的策略是区分追求科学性的“学者马克思”与陷入意识形态错觉的“政治家马克思”,要求以学者的眼光而不是以政治家的眼光来看待社会主义,认为唯有如此才有可能对社会主义思想的科学性做出正确评价。

## (二)从文化维度发掘马克思社会主义思想的当代性

自20世纪以来资本主义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那么,诞生于19世纪的马克思社会主义思想在今天仍然具有现实价值吗?这一问题关乎社会主义思想的当代命运。按照梅茹耶夫的见解,关于社会主义思想当代命运的争论,“最终也就是关于自由在

人类历史中命运的争论,是关于自由在何种程度上是社会发展动力及最终目标的争论”<sup>[144]</sup>。

梅茹耶夫认为,马克思所创建的“历史科学”是以文化为中心来理解历史,将历史过程奠基于文化之上。如果说“历史科学”是以“整个所谓的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sup>[6]92</sup>为理论出发点,那么其核心命题就是,人的劳动归根到底是人本身的生产,更准确地说,是质的意义上而不是量的意义上的人的扩大再生产。人类历史是人通过自己的劳动创造的,因此历史科学所谓之“历史”,既不是观念史,也不是物的历史,而是人的历史,是人据以形塑自身的社会力量和社会关系的历史。就此而言,历史是文化史、人类发展史和人类自由史。以人类自由为标尺,马克思将人类历史划分为“史前时期”和“真正的历史”<sup>[7]143</sup>。在史前时期,人还受到外部必然性的统治,“真正的历史”则始终都是由人类自由所推动。资本主义社会是“人类社会的史前时期”的最高和最终阶段,在这一阶段,自由仍然是受制于外部必然性的人类不得不付出的代价。也正因为如此,在人类自由这个根本点上,社会主义思想对于资本主义的批判至今仍然是有效和深刻的。事实上,在资产阶级社会形成初期彰显出来的个性自由和个人独立性,伴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已经被侵蚀殆尽,人并没有成就欧洲文化所期望的那种形象,反倒是走向了它的反面。

资本主义自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来的发展,特别是工人阶级状况的变化,并没有使社会主义思想成为明日黄花。梅茹耶夫认为,从其理论本源来看,社会主义思想诚然与工人运动紧密相关,但更为重要的是,它与欧洲文明的一般发展逻辑内在地相联。这就意味着,社会主义思想的当代性不仅历史地植根于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工人阶级状况,而且普泛地扎根于资本主义条件下人的一般状况。尽管工人阶级状况在今天由于物质条件的改善而发生了极大变化,但是,人的生存的一般境况并没有获得实质性改变,人类自由仍然不得不屈从于外在力量。正是这一处于更深层面的实情,为以人类自由为基本价值取向的社会主义思想的当代价值提供了客观基础。一言以蔽之,“只要资本主义仍然活着,马克思就将一直活着”<sup>[14]</sup>。

一旦从文化角度来看待社会主义思想并循此而返回其理论本源,我们就会发现,社会主义本质上所要解决的是摆在资本主义社会和每个人面前的文化任务。正因如此,社会主义思想的命运端系于资

本主义文化危机。无论古典资本主义抑或当代最发达最成熟的资本主义体系,都不曾,也不能解决的问题,即个性的自由发展问题。而资本主义在文化上所陷入的困境,终将迫使它在社会主义的方向上寻找未来的突围之路。如果人的自由和发展是人类历史的内在动力,那么一切不以人的自由发展为根据的未来美好社会设想,终究只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而另一种可能性是,当社会进步到筹划技术进步和经济发展的阶段,同时自觉地把人本身的发展作为所要追求的首要目标,那么,它就不可避免地再度需要社会主义设想。因此,从未来维度来看,社会主义思想的价值就在于它是对一种真正地属于人并且为了人的社会形式的自觉追寻。在崭新的社会形式中,人类将摆脱凌驾于其上的经济政治制度的统治,并最终获得充分发展其自身能力的可能和条件。“如果不承认这一点,就意味着不仅不承认社会主义,而且不承认以探索自身存在的意义和目标为己任的整个欧洲文化。这种探索至今仍未完成,只要它还在继续,马克思所确立的方向就仍然有其自身的科学价值。”<sup>[1]81</sup>而拒不承认这一点、竭力排斥人的文化需要和社会主义思想的种种做法,无疑是在斩断历史发展的逻辑,终究要将整个人类导向历史绝境。而这正是一切历史终结论的实质所在。

### 三、梅茹耶夫社会主义论证策略的内在局限

面对各种批评乃至彻底否定马克思社会主义思想的声音,梅茹耶夫坚信“向马克思的回归是不可避免的”,并为此展开了多方面论证。梅茹耶夫的论证,无论对马克思社会主义思想与苏联社会主义理论的界划,抑或对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性的阐释,还是对社会主义思想当代性的发掘,无一不以文化为轴线。这种进路具有令人耳目一新的创新意义,揭示了社会主义研究的一个新领域。尽管如此,毋庸讳言,梅茹耶夫的论证仍然有其内在局限。

第一,梅茹耶夫从文化哲学上来论证马克思社会主义思想的科学性和当代性,但是在他那里,实际上存在着两种文化概念,即广义的和狭义的文化概念。在其广义上,梅茹耶夫将文化与自然概念对举,用以指称“人的社会活动”。这种文化概念其来有自,可以追溯至古希腊先哲对“自然与人为”的二元划分,但由于它将人的一切社会活动及其成果囊括在内,外延过于宽泛,不利于将文化与经济、

政治精确地区分开来。或许是有鉴于此,梅茹耶夫又提出了狭义的文化概念,并将它与文明概念对举。他所界定的狭义“文化”是指自文艺复兴以来所形成的古典欧洲文化,也即人道主义传统,“文明”则是指近代以来所形成的资产阶级文明,例如工业技术、市场经济和民主制度,等等。基于这种界分,梅茹耶夫继而判定古典欧洲文化和资产阶级文明是彼此抵牾、相互对立的,他称之为“文化危机”,并进而主张马克思社会主义思想正是对这一危机的批判性反映。这种看法在一定意义上无疑是正确的,因为马克思社会主义思想的确既是对人道主义价值理想的继承和发展,又是对资产阶级文明的批判。不过,梅茹耶夫没有看到,这两个方面在马克思那里始终是辩证地结合在一起的;正是在这种辩证结合中,马克思得以对资产阶级文明展开内在批判,指证资本主义不能实现资产阶级在其上升阶段所倡导的自由、平等和社会正义等价值目标,同时又深刻地揭示了资本主义文明的发展是在历史地为人道主义价值理想的实现准备必要的物质基础。但是,梅茹耶夫却将古典欧洲文化和资产阶级文明看作是两个分离而并立的事物,这就使得他由此出发为社会主义思想所做的论证,在总体上缺乏厚实的在场性、现实感和历史感。而这恰恰显示了梅茹耶夫的论证在方法论上所存在的缺陷。

第二,梅茹耶夫未能辩证地处理文化与经济和政治之间的关系。在系统地阐述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时,马克思明确地指出:“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sup>[8]591</sup>。由此可知,马克思社会主义思想的确包含一个文化维度,但更为重要的是,它并没有停留于文化层面,而是深入到了文化所赖以奠基的“社会存在”。马克思对人道主义价值理想的继承和发展建立在他对资产阶级文明批判的基础之上。在马克思这里,这两个方面始终是辩证地结合在一起的。然而,梅茹耶夫没有贯彻马克思的辩证方法。由于梅茹耶夫认定“在同一个经济政治空间内,与其他社会思想流派相比较,社会主义显然已经败下阵来”<sup>[1]85</sup>,因此在回答“社会主义用什么才能够与自由主义的法制国家和自由市场理论相抗衡呢?”这一问题的时候,他只好放弃经济和政治领域,退缩至文化领域来把握马克思社会主义思想。进而,梅茹耶夫将人道主义文化和资产阶级文明看作是两个分离而并立的事物,尽管它们共存于资本主义社会之中,彼此之间却只存在

着外在的冲突。基于这种看法,梅茹耶夫往往孤立地谈论文化问题。

第三,梅茹耶夫完全放弃了马克思社会主义思想中的阶级分析方法。梅茹耶夫指斥马克思社会主义思想中的无产阶级因素为一种绝对的乌托邦成分,故而他为了维护这一思想的科学性而将它剔除出去。但是,梅茹耶夫没有意识到,这种“剔除”必将使马克思社会主义思想丧失具体的、历史的能动主体,使它所标举的平等、自由等价值目标倒退为一种类似于黑格尔哲学中“无人身的理性”的东西。进而言之,尽管梅茹耶夫领会到了马克思所构设的“历史科学”是将人本身的历史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但是在梅茹耶夫这里,“人本身”被理解成了抽象的人,而不是具体的人、“现实的人”。事实上,梅茹耶夫对“无产阶级”概念的理解是混乱的。一方面,他要求我们超出经济思维来看待资本主义条件下人的生存境况,另一方面却又以工人阶级的经济状况在20世纪得到了改善为由,宣布马克思赋予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是虚幻的。然而,无产阶级是否负有历史使命,并不取决于无产阶级的物质状况如何,而是从根本上取决于无产阶级所代表的人的生存境况的性质如何。只要资本依然占据统治地位,作为资本之前提条件的无产阶级就始终担负着将人从资本统治下解放出来、将人从对某一阶级的隶属中解放出来的使命。

第四,尽管梅茹耶夫承认自由和平等只有超越资本主义才能得到实现,但他又认为这些价值目标是资本主义的不断发展所自动产生的结果,或者说,它们会自动地,甚至必然地实现自身。这样一来,人、特别是工人阶级的革命性实践就是不必要的,我们所需要做的就是静静等候。用西奥多·阿多诺的话来表述,就是:“什么都不做地躺在水面上,平静地望着天空,‘存在,别无所求,无须任何进一步的言语和行动’,可能会代替过程、行动和满足。……抽象概念中没有哪个概念会比永恒安宁这一概念更接近于实现了的乌托邦。”<sup>[9][157]</sup>由此来看,梅茹耶夫单纯地从文化维度来论证马克思社会主义思想,在很大程度上不过是一种文化幻觉或者说文化拜物教。

不过,梅茹耶夫的论证缺陷并非不可克服。在阐述马克思的人类发展概念时,列斐伏尔正确地指出,它“不能降低为一种文化史,也不能降低为一种经济史”<sup>[10][13]</sup>,相反,“应该全方位地考虑人的

发展,在人实践活动的所有层次上考虑人的发展”<sup>[10][12]</sup>。在我们看来,这实际上也是理解马克思社会主义思想的正确方法。如果我们将这种总体性方法同梅茹耶夫的洞见批判性地结合起来,应当能够为马克思社会主义思想的科学性和当代性提供更加有力的论证。

## 四、结语

对于梅茹耶夫的社会主义文化哲学思想,本文有别于国内学界全盘肯定或者彻底否定的思想,着重梳理梅茹耶夫的社会主义论证策略,并将它归结为三个支点,进而从方法论上对这一论证策略及其优缺点进行评估,力图理清其社会主义论证策略、论据及其结论的逻辑线索。梅茹耶夫选择从文化哲学的视角切入,展开对马克思的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性与合理性的深度论证,清楚地认识到这一点,对于恰当定位梅茹耶夫的思想贡献,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 参考文献:

- [1] B. M. 梅茹耶夫. 我理解的马克思[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3.
- [2] 姜立红, 车德志. 俄罗斯学者梅茹耶夫的社会主义文化论[J]. 山东社会科学, 2016(S1): 560-562.
- [3] 许恒兵. 文化基础、脑力劳动与历史唯物主义批判理论的重建[J]. 理论月刊, 2018(5): 40-46.
- [4] 马克思, 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 [5] 马克思, 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 [6] 马克思.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0.
- [7] 马克思, 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8.
- [8] 马克思, 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 [9] THEODOR A, MINIMA M. Reflections on a Damaged Life[M]. London: Verso, 1951.
- [10] 亨利·列斐伏尔. 马克思的社会学[M]. 北京: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3.

(责编:程爱婕)